

·读书札丛·

吕本中《官箴》出自《童蒙训》原本考

粟品孝

宋人吕本中(1084—1145)著有《官箴》一卷,“虽篇帙无多,而词简义精,固有官者之龟鉴也”^①,长期为人所重。但其书如何形成,历来不甚了然。清代四库馆臣即有疑问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九载:

《官箴》一卷,宋吕本中撰。……《宋史·本中列传》备列其著作之目,不载是书。然《艺文志·杂家类》中乃著录一卷。此本载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中,后有宝庆丁亥永嘉陈昉跋,盖即昉所刊行。或当日偶然题记,如欧阳修试笔之类,本非有意于著书,后人得其手稿,传写镌刻,始加标目,故本传不载欤?

按:左圭为晚宋时人,《百川学海》系南宋咸淳年间(1265—1274)丛书,后世流传的《官箴》一书均由此翻刻而来。观上引内容,四库馆臣对《官箴》一书的由来并不清楚,所谓吕氏“偶然题记”,后人刻印“始加标目”的说法,仅是猜测而已。

其实,《官箴》一书乃脱胎于吕氏另一部著作《童蒙训》。

《童蒙训》是吕本中编纂的一部颇有声名的童蒙教材,其书在历史上多次刊印,广为流传^②。但在流传过程中,该书有不少内容被删,故今传《童蒙训》“已非原本”、“非其全帙”^③,其中删削最严重的就是其“论诗诸说”。至迟清代就有学者注意及此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二载:

考朱子《答吕祖谦书》,有“舍人丈所著《童蒙训》,极论诗文必以苏(轼)、黄(庭坚)为法”之语,此本(《童蒙训》)无之。其它书所引论诗诸说,亦皆不见于书内。

近人郭绍虞先生曾就此问题进行探考,并在《宋诗话考》和《宋诗话辑佚》两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九《〈官箴〉提要》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②今传《童蒙训》既有明刻、清抄等单行本,也有一些丛书收入。据笔者所见和诸书著录介绍,这些版本均源自南宋李埴绍定二年(1229)刻本,除正文外,一般还附有嘉定八年(1215)楼昉跋文(或称序文)和李埴刊书时的题记。其中民国十四年(1925)武进陶氏涉园刊《托跋廛丛刻》本较佳,此本系据“宋绍定本景刊”,阙字极少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多阙字),内中“桓”、“慎”、“敦”等字尚有缺笔,乃避宋帝钦宗赵桓、孝宗赵昚、光宗赵惇名讳,较好地保存了宋本面貌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二《〈童蒙训〉提要》、卷一九六《〈修辞鉴衡〉提要》。

书中予以阐释和辑录,此不赘。

除了“论诗诸说”被删削殆尽外,原本《童蒙训》还有一些内容也已被删去。如朱熹(1130—1200)《小学》卷五有6条标明出自《童蒙训》的内容,全不见于今传《童蒙训》;吕祖谦(1137—1181)《少仪外传》引录《童蒙训》甚多,也有一些不见于今本《童蒙训》;张镒(1153—?)《仕学规范》^①卷二六、二七中有26条内容引自《童蒙训》,其中24条不见于今传《童蒙训》;刘清之(1134—1190)《戒子通录》卷六选录《童蒙训》,更有数十条内容不见于今传《童蒙训》。笔者注意到,这些内容多是关于为官之道的。今与吕本中《官箴》一书33条内容比照,我们发现:《小学》卷五所引6条全部见于《官箴》,《少仪外传》卷下所引则有8条见于《官箴》,《仕学规范》所引不见于今本《童蒙训》的24条内容全部见于《官箴》;更为惊奇的是,《戒子通录》选录的《童蒙训》竟然有30条内容与《官箴》的前30条一致,不但文字无异,且排列顺序也基本相同,只是第8条和第9、第10条的顺序互有颠倒而已。而这30条,包含了《小学》、《少仪外传》和《仕学规范》中见于《官箴》的内容。

为什么朱、吕、张、刘等人明确标为出自《童蒙训》的内容,却不见于今传《童蒙训》,反而见于《官箴》呢?是他们的误题?还是《童蒙训》本有大量为官之道的内容,后为好事者析出而独立成《官箴》一书呢?说误题显得不合情理。不但四人同时误题的可能性极小,而且张镒、刘清之引录甚多,其中见于《官箴》的高达二三十条,包含了《官箴》的绝大部分内容,这怎么可能是误题呢?还有,他们的这些著作都没有提到《官箴》一书,其中《仕学规范》的正文前尚存《编书目》,有《童蒙训》而无《官箴》。又,朱熹不仅在《小学》中把今属《官箴》的内容标为《童蒙训》,而且在与人通信中还说:

吕氏《童蒙训》下卷数条防闲之道甚至,皆可佩服。^②

这里所谓的“防闲之道”,不见于今传《童蒙训》,恰见于《官箴》。如《官箴》载:

范侍郎育作库务官,随人箱笼只置厅上,以防疑谤。凡若此类,皆守臣所宜详知也。

当官既自廉洁,又须关防小人,如文字历引之类,皆须明白,以防中伤,不可不至慎,不可不详知也。

这些显然都属于“防闲之道”的内容。朱熹还曾写信说:

吕氏《童蒙训》下卷论守官之法亦颇明备,暇日更试考之,当有益也。^③虽然今传《童蒙训》尚存一些为官之道的内容,但已不多,结合朱熹前书,这里所谓的“颇明备”的“守官之法”,主要还是那些现存于《官箴》中的内容。

可见,朱熹、吕祖谦等人在著作中引录《童蒙训》中为官之道的内容不可

^①此据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《宋史》卷二百零七《艺文志》“张镒”作“张磁”,恐误。

^②《朱熹集》卷三九《答范伯崇》第八书,四川教育出版社点校本,1996年。

^③《朱熹集》卷四五《答欧阳庆似》末书。

能是误题,真正的事实是,今传《官箴》实际就出自《童蒙训》原本。这从二书的由来及流传情况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。

《童蒙训》一书见于《宋史·吕本中传》,在南宋社会流传甚广,不仅当时的书目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和宋末元初的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有著录,而且也为许多学者所亲睹,并加选录、徵引。反观《官箴》一书,则情形大不然,既不为《宋史·吕本中传》所列,也不见上举书目著录,而且宋代学者绝少论及,像朱、吕、张、刘等人不但只字不提,反而无一例外地在著作中把见于今本《官箴》的内容标为《童蒙训》所出。其中吕祖谦为吕本中侄孙,对吕本中著述甚为了解,在其《少仪外传》中备列吕本中著述,但对《官箴》不著一词。这就说明,朱、吕、张、刘等人并未见过《官箴》,在他们生活的时代,也许根本就没有独立的《官箴》一书。

那么《官箴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?较朱熹晚一辈的浙江永嘉学者陈昉曾得见此书,并加刊刻,他在跋文中写道:

昉颀蒙之资,早膺吏事,尘嚣驰骛,无所津梁。既得此书,稍知自勉,敬
侵于梓,与有志者同之。宝庆丁亥岁三月既望,永嘉陈昉谨书。

按,宝庆丁亥即宝庆三年(1227),其时朱、吕、张、刘等人均已下世。此跋甚简,不详其从何而得此书,但既云“得此书”,则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单行本了,只是不太可能早于朱熹、吕祖谦生活的时代。

然而吕祖谦的《东莱别集》卷六中收录有吕本中的《官箴》,因本中官至中书舍人,故标为《舍人官箴》。据吕乔年嘉泰四年(1204)跋文^①,乔年在其父吕祖俭“次辑”祖谦《文集》的基础上,继续对吕氏论著“刊补是正”,增加了《别集》、《外集》和《附录》等内容,其中“凡家范、尺牋、读书杂记之类,皆总之《别集》”。在《别集·家范》中,除了吕祖谦本人的论著外,还添入吕希哲的《家塾广记》和吕本中的《舍人官箴》。据此,至迟在嘉泰四年(1204),《童蒙训》原本中为官之道的内容就已被析出,而以《舍人官箴》为题收入《东莱别集·家范》。这或许就是陈昉刻本之所本。

当然,《舍人官箴》与今传《官箴》仍有些许不同:第一,没有《官箴》最末的3条。由于《戒子通录》选录的《童蒙训》也无今传《官箴》最后3条内容,因此这3条极有可能是后来翻刻者所加,而非《童蒙训》原本所属。第二,第8条和第9、第10条的顺序颠倒。这也与《戒子通录》所收《童蒙训》相同。第三,中间缺载见于《官箴》的5条内容。此5条却为《戒子通录》选录,因此很可能是在收入《东莱别集》时录写或刊刻遗失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^①吕乔年:《东莱吕太史文集跋》,载《吕东莱先生文集》卷首,丛书集成初编本。